

中外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动态与新进展*

——“十八世纪以来中外货币金融制度变迁 学术研讨会”综述

伏 霖 兰日旭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在现代世界兴起、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的制度及其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很多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①经济史学界也对制度变迁及其内在动力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区别于以往认为制度变迁是外生冲击影响的结果,近年来更多的研究从制度变迁内生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其中尤以诺斯(North)等^②和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诺斯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少数精英分享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权利限制社会”(Limited Access Society)向权利平等的“权利开放社会”(Open Access Society)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精英阶层的内部竞争^④(Intra-Elite Competition)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却认为由排他性的制度向包容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是精英阶层内部竞争占主导,而是精英—平民的竞争(Elite-Citizen Competition),精英在统治的过程中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权利,需要不断地与平民阶层分享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精英阶层与平民社会的不断博弈是推动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外货币与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国外,诺斯和温加斯特(Weingast)研究了十七世纪英格兰金融制度变迁对后续英格兰资本市场发展和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⑤拉伯塔(La Porta)等人研究了法律体系对银行体系所有权结构及后续经济发展的影响;^⑦斯塔萨维奇(Stasavage)通过分析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债券利率的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了不同于诺斯和温加斯特的结论,其认为英国金融

[作者简介] 伏霖,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081,邮箱:fulin07@gmail.com。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081,邮箱:galenlan@163.com。

* 本文为中央高校课题“中外金融组织变迁”(批准号:020550315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关于历史事件、制度及其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参见以下两篇文章:Nathan Nu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1, No. 1, 2009, pp. 65 – 92; E. Spolaore and R. Wacziarg, “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1, No. 2, 2013, pp. 325 – 369.

② D. C. North et al.,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M.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D. Acemoglu and J.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N. Y.: Crown Business, 2012.

④ 这里的“竞争”既包括政治上的竞争也包括经济上的竞争。

⑤ 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1989, pp. 803 – 832.

⑦ R. La Porta et al.,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7, No. 1, 2002, pp. 265 – 301.

市场的制度变迁直至 1740 年之后才得以实现;^① 哈里斯 (Harris)^② 与萨斯曼 (Sussman) 和雅菲 (Yafeh)^③ 通过研究英国 17 至 19 世纪的金融市场,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认为对债权人有效保护的制度变迁直到 19 世纪才得以确立。除了大量对英国的实证研究之外,经济史学者也将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扩展到了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摩洛哥。^④

在国内,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量化历史研究的推进,关于近十年来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出现诸多新动向:第一,在保持对典型案例和事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数据库的建设和整理。例如陈志武、袁为鹏和彭凯翔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清代以来的利率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粮价、契约文书、商业账本资料库的建立以及基于此的彭凯翔^⑤和薛华^⑥等对近代市场整合和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第二,从新的视角对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进行分析和讨论。例如管汉晖对 20 世纪 30 年代自由银行市场的研究,^⑦ 兰日旭用交易成本和博弈论的框架分析了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变化,^⑧ 李楠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近代乡村借贷市场行为。^⑨ 第三,注重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国际比较。例如杜恂诚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总结。^⑩ 特别是首届中财经济史学术年会——“十八世纪以来中外货币金融制度变迁”,进一步反映了当前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的新进展。

此次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于 2015 年 11 月 7—8 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7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近代早期以来货币制度变迁、金融市场的发育和整合、金融制度变迁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会议共收到 51 篇论文投稿,有 42 名参会学者在此次大会的主题演讲和分组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

在开幕式上,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信用关系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更是传统与外来冲击交互影响下制度变迁的典型,货币金融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明孔研究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指出经济史研究中“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重要性,并结合编审工作回顾和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新特征,对未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充满了希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涛教授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

① D. Stasavage, “Credible Commit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orth and Weingast Revisited”,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8, No. 1, 2002, pp. 155 – 186.

② R. Harris,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688 – 1850”, in R. Floud and P.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1: Industrialisation, 1700 – 1860)*, Cambridge M.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4 – 237.

③ N. Sussman and Y. Yafeh, “Institutional Reform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overeign Debt: Britain 1690 – 17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6, No. 4, 2006, pp. 906 – 935.

④ S. Démurger et al.,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 No. 1, 2002, pp. 146 – 197; L. Guiso et al., “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No. 3, 2004, pp. 929 – 969; R. Burgess and R. Pande,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780 – 795; D. Berkowitz et al., “Does Finance Caus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Origins of Banking in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139*, 2012; M. Fafchamps and M. Schündeln,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oroc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03, No. 4, 2013, pp. 15 – 28.

⑤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⑥ C. H. Shiue, “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5, 2002, pp. 1406 – 1419; C. H. Shiue, “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4, No. 1, 2004, pp. 101 – 125.

⑦ 管汉晖:《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⑧ 兰日旭:《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⑨ 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中国乡村无息借款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⑩ 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表示了热烈欢迎,并谈到经济史研究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是学科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源泉。

在随后的主题发言中,来自清华大学的陈争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姚遂教授、武汉大学的陈锋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的戴建兵教授、清华大学的龙登高教授、南开大学的王玉茹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的温锐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巍教授分别就“实际币制与币制演变”、“金融史的学习与展望”、“银两制度与银元币制”、“银两制度的出现与演变”、“草根金融与创新”、“金融监管与有限责任制度”、“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体制”、“中国近代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等重要问题”等题目作了精彩发言。会议后续在分会场中,分别就“货币制度变迁”、“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变迁”以及“金融市场整合与公司治理发展”三个主题进行了论文宣讲和讨论。

一、货币制度变迁

学界对于民国时期货币市场脆弱性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竞争性的货币发行制度和白银的国际流动是货币市场脆弱性的根源。如习永凯(河北师范大学)研究了1914—1920年中国白银的流动表现,指出一战期间各国政府对于白银价格及流动的干涉及控制是此时期白银流动异常的主要原因,认为从这一点上也体现了白银外部供给约束下中国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康金莉(石家庄铁道大学)通过对中国竞争性货币发行历史的考察,认为竞争性货币发行不能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具有引发持币风险与投机、增加交易费用、增加市场不确定因素等弊端;马长伟(安徽师范大学)也认为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论证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好的认证。但另外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自由银行体系制度不但不是脆弱性的来源,更是发挥着金融稳定器的功能,如刘愿(华南师范大学)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中心,考察了自由银行体系的运作及法币改革这一市场结构变化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从微观视角证明了自由银行体系的金融稳定器功能,认为恰恰是法币改革破坏了自由银行体系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为以后的恶性通胀埋下了伏笔。

在货币制度特点及其变迁的研究方面,何平(中国人民大学)分析了我国货币制度变迁的历程,认为期间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推动我国白银货币化的重要因素;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通过计量模型和史料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二元货币体系,认为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维持是二元货币体系稳定有效维持下去的基础,而二元货币体系与经济结构相互融合、固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均衡,这也是造成近代二元经济结构长期维持的原因;管汉晖(北京大学)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和基于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元代初期纸币稳定运行的基础在于严格的银本位制度,但中后期随着军事活动造成的财政压力骤增,稳定的贵金属本位制度难以长期维系,这也是造成元代纸币从稳定到温和通胀,再到恶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张百顺(山西师范大学)以法币改革前“检查准备金案”为案例,分析在制度塑造过程中政府与商人组织相互博弈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刁莉(武汉大学)通过回顾欧洲及中国的货币发展,从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运用合约理论模型揭示了货币产生及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具有的合约能力;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分析了1430—1935年中国稳定的白银货币体系;成艳萍(山西大学)研究了对外贸易顺差在白银流入和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中的重要作用;刘成虎(山西财经大学)利用日文原始文献资料,探讨了币制改革过程中日本军部所进行的干预。

二、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变迁

在近代金融机构变迁的研究方面,一部分学者研究了金融机构变迁的内在动力,如兰日旭和张琥(中央财经大学)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近代中国银行同业在特定经营环境下所经历的从恶性竞争向适度合作的转变过程,认为这种适度合作的帕累托改进很大程度上需要构建在地缘、学缘、友缘、业缘等关系的基础上;路乾(中央财经大学)梳理了美国麻州早期银行发展的历史。另一部分学者分析了经济和制度的冲击对近代金融机构的影响,如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用详尽的史料